

1019

WUXI WEN SHI ZI LIAO

无锡文史资料

第 33 辑



江苏省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 | |
|--------------------|---------------|
| 博古办报 | 黎 辛 (1) |
| 江东平同志小传 | 乔 迁 (10) |
| 怀念包厚昌同志 | 方玉书 (11) |
| 季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领导 | 李 正 (21) |
| 为抗日救亡运动加一把力 | |
| ——无锡鼋头渚“万方楼会议”纪实 | 薛葆鼎 (27) |
| 两个无锡人在香港华润公司 | 张 平 (34) |
| 立身香港 心系祖国 | |
| ——记无锡籍著名实业家唐翔千 | 邬鸣飞、严卫民 (44) |
| 雪泥杂记 | 章剑慧 (59) |
| 纺织界名人章剑慧 | 陈可焜 (70) |
| 香港 83 岁实业家王云程访谈录 | 柯兆银 (90) |
| 旅美画家杨令弗的归国梦 | 窦应恭 (99) |
| 太空衣之父——唐鑫源博士 | 陈藏生 (104) |
| 巴西圣保罗的无锡大老板 | 陈明生 (105) |
| 程志新先生事迹 | 本刊资料室 (107) |
| 诀别故乡行 | |
| ——追忆三哥程志新 | 程志翔 (111) |
| 在江南大学文浩科学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 程志新 (115) |
| 化雨春风,养吾浩然正气 | 文浩科学馆同仁 (117) |
| 程志新先生传略 | 朱邦华 (120) |
| 旅台著名实业家程志新 | 华振范 (124) |

2043/14

精灵古怪的吴稚晖
吴稚晖与国语注音符号

黄萍荪 (127)
高恕新 (139)

萍踪琐忆
建国前无锡最大的化工企业
——允利化学工业公司

周可宝 (142)
薛禹言 (152)

清名桥之春(水彩画)

梁元 封面

主 编 顾文壁
编 审 周 贤 何莘耕
责任编辑 辛道国

无锡文史资料 第 33 辑
江苏省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编辑出版	无锡市政协文史编辑室	印 刷	锡梁印刷厂
地 址	无锡市前西溪 1—3 号	发 行	内部发行
电 话	(0510) 2719073	邮 购	本刊发行部
邮政编码	214001	出版日期	1997 年 1 月

苏锡新编(K)第 235 号

工本费 6.50 元

本文作者与博古在一个报社共事多年。文内所忆及的事,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体例和编排。另外,本文的史料价值,也值得注意。请看——

博古办报

· 黎 辛 ·

博古(秦邦宪)是我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也是卓越的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50年前的1946年,博古代表党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工作。4月8日,与中央委员王若飞、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等13人,冒着恶劣天气自重庆飞返延安,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创办《解放日报》,政论“一把手”

1941年春天,博古在重庆党的南方局工作时,对不发表真实消息和人民意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检查制度深为痛恨,希望在延安创办一份日报和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

5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说:“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为一个委员会管理。”

这个任务落到博古身上,他担任了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

《新中华报》5月14日停刊,工作人员立即搬到延安城东的清凉山集中,并召开编辑部第一次会议。

博古在会上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性的党的机关报,就要有鲜明的立场,在政治上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事物的演进,文字要生动,写作反对公式化。我记得,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了党报工

作者应有的态度，各部门的任务与发稿时间。

《解放日报》于5月15日试刊。毛泽东写了七个报头字供选择。博古拿到工厂征求意见，最后听了拼版的刘立夫师傅的意见，选了一个“不长不短，字体也好”的报头。

试版报纸经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审阅后同意，16日正式出版。发刊词是毛泽东写的，仅一千字，言简意赅，说：“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18日，毛泽东又写了纵论天下大事的文章《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社论，毛泽东写社论，每次都会附有一短信给博古，大意是：写了篇稿子，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博古拿到毛泽东的稿子，总是立即给其他同志传看，并仔细给大家讲解，研究毛泽东文稿的高深思想和独特风格。

博古本人也是《解放日报》写作社论最多的作者之一。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与国民党斗争的社论，大多由他执笔。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使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新闻，配发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德国法西斯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25日，博古根据23日毛泽东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的指示》，写了题为《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社论，最早向全世界发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号召。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的讲话只谴责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犯。英国、美国共产党等兄弟党，发表声明也只是要求给苏联以支持和合作。《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27日发表《苏联红军——不可战胜的军队》，29日发表《勿中法西斯奸计》，29日发表《苏必胜德必败》，30日发表《保卫人类文化，打倒法西斯》，这一系列社论从各个方面阐明苏胜德败的必然，讲解了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而且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道理。而对于中国，这战争才真

正是“成败荣辱莫不休戚与共，几无东西彼此之分”。《解放日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始终走在世界舆论的前面。

博古才华横溢，写作旁征博引，雄辩妙趣，而又犀利无比，他曾利用“红叶题诗”的典故，讽刺重庆国民党反动派与汉奸汪精卫暗中勾结的丑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的7月21日发表的社论《苏德战争一个月》，以希特勒闪电战的破产断定了法西斯的最后失败，社论结尾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让希特勒在梦中狂笑吧！古人说过：梦为欢笑，起而哭泣！”

文艺栏主编舒群在1942年9月中旬参加毛泽东和博古在枣园召开的为《解放日报》副刊组稿的会议之后，曾告诉编辑陈企霞和我说：会上毛泽东举杯敬酒前，向坐在右侧的博古低语几句，起立致词，接着个个畅饮，众声纷起，而博古则默默无言，目不转睛，一边吃喝，一边奋笔疾书。原来刚才毛泽东指示他写社论，餐毕，他写的社论也交卷了。博古的笔是战斗的笔，他为抗战与革命写作常常是“速战速决”。博古讲话声音宏亮，逻辑性强，语句完整，记录下来，分开段落，加上标点，便是一篇文章。至今仍被新闻工作论文集选辑的《党报记者要注意什么问题》，就是记者洪流记录，在博古去世后发表的。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件大事

在办《解放日报》之前，博古管过《新中华报》和新华通讯社，但没有编辑过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该怎么办？博古考虑是立足全党全国，放眼世界。在版面安排上，一版发要闻和欧洲消息，二版是远东，三版是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下半版是文艺栏与专刊。报纸天天出，成果日日有，编辑辛苦干，读者争着看，作为编辑，我们当时的自我感觉是挺好的。

想不到1942年元月26日，毛主席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突然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种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

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其原因,或者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文件当时报社没下达,就是听,我也不会明白,现在回想,这是整风的预告和准备。

事有凑巧,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宣部召开的研究怎样把文章写短些的“压缩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是党史上著名的整顿三风的报告,从此在延安普遍地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可是这两次重要演说的消息却被分别发表在报纸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标题只有三栏,毛主席的讲话在每条消息里只写了三百字左右。这大概就是“某些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残余并没有肃清的表现。于是,2月11日中宣部指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思想,并没有贯彻到整个党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党在宣传教育部门,没有把贯彻党的这一思想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

3月16日,中宣部又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严厉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改革,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的生活。”

通知还指出,如果报纸只是或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正在这时,报社又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文艺》副刊在3月13日和23日分别发表了王实味的总标题为《野百合花》的四段杂文,不少人认为对延安的生活作了偏激的丑化的批评,引起许多读者,特别是几位将军的不满,毛主席发脾气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3月17日,博古在编辑部与报社干部大会上检讨报纸的错误,并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自我批评,提出报纸为增强党性

进行改版。

改版自4月1日开始，版面改为一版要闻，二版边区和国内，三版国际，四版全是副刊。报纸宣传要“以我为主”，加强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加强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生活的报道。9月份，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是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因为西北局没有党报，为此西北局提出了加强与《解放日报》联系的具体办法。这种作法在建国后仍被一些中央局所采用。

3月31日毛主席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又说，“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又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后边说的显然是批评《野百合花》。

博古在报社内部多次检讨。编委会的其他同志也作检讨。博古说中央批评的是我，报纸的错误应由我承担。3月31日的改版座谈会上，博古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说：“报纸没有能完成应有的责任。对党的路线没有贯彻，登载群众的活动太少又没有起组织者的作用。”博古列举了许多事实，然后提出请求大家指教帮助。

4月1日改版的社论《致读者》是由博古执笔的，他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报纸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博古的检查和提出的改进方针、方案与中央的批评是一致的。《解放日报》改版被称为党报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影响极为深远。

遵照政治局决议，9月22日，博古以《党与党报》为题又撰写了社论，进一步指出报纸这个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不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最早响亮地提出“报纸是

党的喉舌”。1944年2月16日博古撰写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4个字。”社论最后说,“办报是全党的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我们要好好学习。”

《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开展通讯员工作》、《政治与技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提高一步》、《从五个w谈起》等许多篇社论,多数是博古执笔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胡乔木写了专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总编辑陆定一写了专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他们把马列主义办报理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与《解放日报》的实际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新闻理论。

批评人讲究政策,不拘小事

博古对记者管理极严格。1941年,几位记者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报道,因平时感到个别单位不支持记者采访,竟通过某参议员,向大会提出一个“尊重记者采访自由”的提案,被会议党组织发现,说服提案撤销,并向报社领导报告。

会后一个晚上,博古找来这几位记者谈话,向他们指出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还不同,记者的采访是自由的,记者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报道,不能够提提案,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我正从办公室外经过,听到博古嗓门特大,特意问记者海燕,博古发什么脾气?他说,博古这次真的气坏了,声音特别大,但言之有理,又有分寸,我们个个心服口服。

虽然如此,博古还是知道发脾气不对,他在编辑部会上自我批评,此后再没有发脾气。博古批评人讲究政治,不拘小事。

1941年,有一次小鬼担饭上山开饭,分饭时发现小米饭夹生。陈企霞尝了一口饭不能吃,往剩饭桶里一倒,说:“这饭怎么能吃?”接着又有人往剩饭桶里倒饭,说:“回窑洞煮挂面吃!”

这一年延安生活最苦,虽然每餐都带剩饭桶来,却很少有剩

饭,现在有人把整碗饭倒掉,是件绝无仅有的大事。背后有人说陈企霞是“罢饭”,陈企霞在党小组会上说一句“发脾气不好”就完了。博古呢?则立即去找总务科长葵孝父商量改善饮食,要求大家吃得饭热菜香。由于博古的关心与体贴,我记得报社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最好的。

报社生活好,还来自三五九旅的关照。当时报社编辑部也搞农业生产,可是只种不收——春天上山开几十亩群众丢弃的没有地力的二荒地,又不上肥,草都不长。而三五九旅生产自给有余,旅长王震让部队在金盆湾为报社选好地开荒办起农场,种菜、养猪,还送给报社良种、纺纱车和大米呢。

1943年7月15日到7月底,延安进行了半个月的“抢救运动”,抢救所谓“失足落水的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分子”。因为把敌情估计过重,抢救过急,搞“逼供信”,误伤了不少同志。博古作“抢救报告”,是照本宣科,并不加码。对社会部要求逮捕的报社的“特务分子”,提出了不同意见。博古虽然受到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整风领导总学委副主任兼社会部长)的批评:“你们清凉山特务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抓不出来?”博古也没有亲自动手“抢”“救”“训”“骂”。

“抢救”结束,编辑部平日欢乐的气氛变得沉闷了,“政治问题”包袱压得许多人抬不起头来。1944年春节开始对抢救的人进行甄别,为恢复良好的气氛与做政治思想工作,编辑部第一次举行春节联欢会和跳舞会。没有舞场,便把西边三个办公窑(边上的两孔窑洞是连接的)的桌凳统统搬出来,煤油灯集中高挂,辉煌非常,自制的红绿纸花高悬窑顶,有的跳舞,有的讲故事笑话,有的猜谜。博古创作的谜语最多。博古请受过审查的陈企霞掌握谜底与发奖品。

记者穆青熟悉此事,我俩共同回忆起四则有趣的谜语。其中,有一个是英文“TEN”打一中文字,一个是中文“十”打一中文字。

穆青想,英文TEN是个“十”字,迅速说是“谭”,博古哈哈大笑,说,TEN,“西言曰十”,正是个“谭”字。快午夜了,中文“十”字

尚无人破译。艾思奇从隔壁跳舞过来，陈企霞说：“老艾猜猜，可能差不多。”老艾看了说，“我看看再猜嘛。”穆青抢着说：“是个‘思’字。”稳妥的哲学家老艾说：“‘十’字是田的心，当然是个‘思’字。”

博古很尊重下级的劳动。1942年吴文焘任新华社副社长以后，往分社发指示和要求，吴署名为“总社博古”，送博古审阅时，被改为“总社博、吴”。博古说，这主要是你们的劳动，你应该签名，由两人签名也表示共同负责。

1943年初，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吴文焘指出新华社没有广播近期《解放日报》刊登的对各种根据地有指导作用的稿件，吴文焘立即播出并写出书面检讨。博古看后，立即写上“这责任应由我负”。在很多时候，博古都表现出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尚品德。

博古潜心于工作和事业，越忙越有劲，医生提醒他因过度疲劳已经使心脏扩大，他仍拼搏不止。早晨副总编四点打铃“上早班”，他跟着起床审阅新闻稿，接着看副刊稿，新华社播发的稿件与指示、要求不断地送来。凡重要稿件博古和总编或副总编都要校对，校对方法是找一位编辑合作，念文字并念标点，他校对；接着换过来他念，编辑校对，以确保无误。博古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天就是这么平凡而具体地干的。荣誉与尊敬来自平凡的劳动，并非有权有钱就可以得到的。

“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的外交，博古的学问”

为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延安开展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播过马达（一小时约可挣半斤小米），朱德总司令开荒种地，博古说他参加体力劳动不行，可以抓紧时间翻译作品，用稿费交生产任务，博古译过《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化历史观的发展》等书，后者是普列汉诺夫写的极难翻译的哲学著作。博古还校改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著作，在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解放日报》转载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郭沫若的《屈原思想》。那时重庆报纸用的都是薄而颜色暗的土制新闻纸，字迹不清，经过手上有油墨的工人拿着报纸排字，有的字还没排就已模糊难辨，工人排不出或错排多，校对难校。这天轮到我看清样，急得我满山转请教熟悉古籍的同志包括老艾，最后还剩有引用屈原原作中的三个字弄不清楚。老艾说请你去问博古，若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去找毛主席。我问博古，他马上说出两个字。最后一个字，他闭着眼仰起头使劲想，最后说是个×字，说完又看看清样，哈哈大笑了，说，对的，是个×字。

博古生性聪敏，博学多识，以“博古通今”闻名。抗战初期，传闻有女同志议论找爱人的条件，是：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的外交，博古的学问。可是博古的学问究竟怎么样？我是在他领导下逐渐有些了解的。

谁去博古窑洞找他，门岗一般不挡，可以自由进出。一进窑总是见他伏案工作。他在靠窗的大桌写作，看文件，窑当中一个小方桌上斜立着俄文版的马列著作，书前放着稿纸，抬头看一句原作，低头译一句中文，一遍定稿，极少改动。有谁劝他适当休息，他说：“我们吃新闻饭，我又兼出版局长，应该这么做。”我在报社工作六个年头，见博古参与娱乐活动，包括1944年春节晚会在内，只有很少几次。

在博古言传身教下，清凉山同人没有不安心工作的，且有自豪感，许多人都准备一生做编辑做记者做校对，做党与人民的喉舌！

然而革命形势比预计发展得快，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日报》与新华总社抽调约10人赴东北解放区创办《东北日报》与新华总分社。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陆续从报社总社调人去解放区工作。建国后，当年报社与新华社的许多编辑记者，陆续做了全国性报纸与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助理编辑与校对一般也做了省、市新闻单位负责人，有些改行的编

辑,先后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有4位,还有几位担任党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博古同志率领与培养的学生真可谓满天下了。

江东平同志小传

· 乔 迁 ·

江东平同志、别名祝天祐、祝苦农,1913年12月生于无锡梅园祝家坦村。1938年参加革命,曾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冀南威县县长。1943年任太行区磁武县县长时,曾广泛组织发动全县群众,用人海战术消灭了铺天盖地的蝗虫,保住军民口粮,受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奖励。同年,因汉奸告密,突遭袭击,肺部被敌人刺伤两处。其后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任秘书。

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建国后任华东局农委办公室主任,此间他参与领导土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正确贯彻党的政策。

他在财政部工作时间较长,主要抓农村财政工作。历任财政部农税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财政部政治部主任,财政部副部长。他长年累月深入农村基层,调查实际情况,工作一丝不苟,指导工作有卓识与改革见解,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通报表扬。他还将诸多调查资料编印成书,供财政系统从事农村财政的干部学习,他对农村财政工作政策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东平同志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一生清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能正确贯彻中央方针、路线,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

江东平同志于1986年7月20日逝世,享年73岁。

怀念包厚昌同志

· 方玉书 ·

包厚昌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年了。他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与广大人民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解放以后，他在无锡市任副市长、市总工会主席、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仍然以一个普通革命战士的身份，与人民群众亲密联系。他朴实无华的装束、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通俗风趣的无锡民间口语，给无锡人民以格外的亲切感；而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简朴的生活作风更是令人敬仰。工人群众亲热地称呼他为“老包”，最喜欢听他讲话，最愿意和他讲心里话，迄今有些老工人还想念他。我因工作关系，解放后几十年里与他多有接触，并有深厚情谊。现应市政协文史编辑室之约，就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几件事记述于后，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亲切关怀三位革命老太

秦起是1927年北伐革命时期无锡总工会委员长，当年在无锡“4·14”反革命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的母亲和弟弟秦超遭受迫害，吃尽逃亡流离的痛苦，直到1949年无锡解放时，秦老太才栖身于惠山一家祠堂里，秦超则改名换姓在吉祥桥堍一家小酱油店当店员。我当时是《苏南日报》记者，在寻访秦起烈士事迹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向包厚昌同志反映。他听了十分激动，马上要我约了秦超陪他一起到惠山去看望秦老太。当时秦老太已年近花甲，面容憔悴，精神却很好。包厚昌第一句话就说：“秦起为无锡人民的解放最早献出了生命，我代表无锡工人来看望你、慰问你。我现在是无锡总工会主席，也就象当年秦起当总工会委员长一样，我也就是你的儿子，你有什么困难，都

可以帮你解决。”他边说边扶着秦老太的双手，就如同扶着自己的母亲一般。秦老太当时最迫切的是希望解决住房问题。在1952年无锡第一批工人住宅——五里新村于西门外荒丘上建成时，秦老太是第一批迁入的住户之一，包厚昌亲自帮着安了家。此后，每到逢年过节，包厚昌总要去走访老人家，嘘寒问暖，并送去生活必需品。有时，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太，坐下来喝杯茶，谈谈家常。这时，新村里邻近居民纷纷涌来，都说，老包来了。有什么心里话，都来向这位总工会主席诉说。包厚昌同志正是通过走访秦老太的机会，和普通的工人群众以及他们的家属建立起亲密的联系。

另一位老太是陈凤威烈士的夫人，解放时住在前西溪1号，即薛氏家院的一座楼房的二楼。当时《苏南日报》员工宿舍也在这院里，我们起初并不知道楼上一家母子几人是陈凤威烈士的遗属。包厚昌和其他几位老战友来探望陈老太，他告诉我们：“陈凤威同志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初期是领导锡北抗日游击队的主要人员，担任‘江抗’锡北办事处主任。敌伪‘清乡’后，他继续坚持斗争。1942年10月，我从苏北渡江回到锡北，传达上级指示，研究今后工作。陈凤威当时是中共锡澄工委书记兼锡澄办事处主任，就在他参加晚上会议后的第二天，被敌伪包围，他与当时锡澄中心县委委员史雨生同志2人渡河突围时溺水牺牲。他们和其他几个同志的牺牲，是无锡地区抗日武装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里十分悲痛。现在她母子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终于盼到了解放，我们应该来向她们表示慰问和关怀。”包厚昌同志象对待自己的亲戚一般，常来走访。陈老太至今还健在，已经90岁。她的三个孩子后来都升入高等院校深造，成长为国家干部。儿子陈钟英是市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随侍在侧。他们谈到当年包厚昌给予的深情厚谊时，总是心情激动，难以忘怀。

包厚昌同志走访的第三位老太，是家住小娄巷的孙老太。这位老妈妈有三个女儿参加新四军，丈夫是教师，中年早逝，遗下四个女儿，靠她微薄的缝补收入艰难抚养。在困苦中成长的四姐妹，大

姐孙顺、二姐孙顾、三姐孙硕在学校读书时较早接受抗日救亡活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即积极参加无锡的救亡活动，与包厚昌等同志有联系；日军侵入无锡，她们就加入“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离家到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只有年幼的小妹涵若留在母亲身边。老太不仅支持女儿参加革命，还不断接济女儿。孙硕（参加革命后改名孙石）1943年在中共苏南茅山地委组织部工作，与当时负责苏（苏州）锡（无锡）区地下工作的李希之结婚，1944年因怀孕回无锡老家，在母亲照护下生了个男孩，取名“小石头”，产后仍回新四军部队。孩子则由外婆抚养。李希之是我当时在苏锡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他曾经叫我到无锡送东西给孙老太，上海解放时，李希之和孙石在上海工作，还由我把活泼可爱的“小石头”送到父母处。因此，孙老太把我看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小妹孙涵若解放前经地下党帮助，进入振新纱厂做小职员，解放后是第一批工人骨干，参加了工会工作。包厚昌同志对孙老太是十分熟悉的，他经常去拜访这位亲如慈母的老人。我也多次在孙家和厚昌同志相遇，交谈地下党活动的情景，因此使我与他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记者与领导干部之间的工作联系，在我心目中，他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兄长和战友。

曾经想当个新闻记者

我原来的印象包厚昌同志是个工农出身的革命战斗英雄，他自己亦总说：“我是个大老粗，读书不多，不象你们大记者，是个知识分子。”但以后我与他接触多了，才深深感到他说自己是“大老粗”这句话是过于自谦了。

1954年我调任市委机关报总编辑，当时他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有一次我把起草的一篇报纸“社论”，请他审阅。他仔细看过，明确指出文章中不少问题：有的提法太含糊，有的地方有片面性，有些句子还不够完整，甚至有些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等等，并提笔在原稿上作了修改。他这种字斟句酌的认真态度，使我十分佩服也十

分惭愧，看到他写的一手秀丽的钢笔字，我才恍然认识到这位可尊敬的“包大人”哪里是什么“大老粗”！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锻炼，已经是“满腹经纶”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1955年秋天，他已任市委书记，为准备召开市党代表会议，组织了一个文件起草班子，由他亲自主持，还有宣传部长方非和市委办公室几位秘书，把我也拉了进去。我们一起住到小箕山锦园，先学习中央文件，再联系无锡实际，讨论起草文件纲要，然后分工执笔，反复修改。白天工作很紧张，只有晚上可以轻松地逛逛风景区。中秋节晚上，皓月当空，清风徐来，湖光山色，分外秀丽。包厚昌提议今晚要好好玩一下，约我们乘上汽艇到太湖去兜风赏月。因大部分人回家过节，艇上人不多。包厚昌同志兴致很好，和我们谈得特别亲切。他对我说：“你们新闻记者的工作，我真是十分羡慕。因为你们记者可以到各个基层，到群众中去采访，听取群众和干部的各种想法和意见；不象我当了市委书记，不能随便行动，随意外出，再也不能象解放初期那样跨上自行车和你一起下基层去拜访工人群众。”他说得来劲，深情地说：“不瞒你说，我过去也曾经想做个新闻记者呢！”他随着讲了自己的过去：“我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只读了二年半书，只是后来到了城里学生意，在崇安寺观前街一家纸马店当学徒时，偷偷读了不少书。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我又读了许多进步的书刊，加上当时无锡《人报》馆的几位思想较好的编辑记者的影响，我积极参加了当时的业余读书会，开始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由于我思想激进，行动积极，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党嫌疑犯’名义逮捕，在牢狱中耽了50天，吃尽了苦头。直到1936年5月20日才被保释；又被老板解雇，失了业。当时心中真是气愤万分，恰巧报上刊出上海将出版《中国的一日》，时间定在1936年5月21日，由茅盾主编，向全国公开征稿。我激动地写了篇千把字的短文《离狱》，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控诉当局的暴行。这篇稿子居然被录用了。我收到了一册烫金字的精装本《中国的一日》，真是欣喜若狂，头脑里就响往着靠